

• 当代中医丛书

中医系统论

● 祝世讷 孙桂莲著 ● 重庆出版社



●当代中医丛书

中医系统论

●祝世讷 孙桂莲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 先
封面设计 姚长辉
技术设计 刘忠凤

祝世讷 孙桂莲 著
中医系统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151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3,001—6,000

*
ISBN 7-5366-1308-3/R·67
科技新书目224—367 定价：7.3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关于中医学方法论研究的专著，着重阐发了中医学的系统论思想。全书以现代系统科学为理论武器，分析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科学传统及其孕育的两种医学的巨大差别；深刻揭示了中医学特色的实质和核心是其系统论思想；具体讨论了中医系统论思想在其基础理论、临床医疗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论证了中医系统论思想在科学和医学的未来发展中的巨大优势；提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医系统学的设想。

本书运用较多的现代科学知识，思想深刻，理论性强，富有启发性，适合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特别是关心中医学现代的人员阅读。

《当代中医》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董建华 侯占元 张锡君

副主编

余朋千 萧德馨 吴伯平 傅景华 许志仁

顾 问 (下面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友生	邓铁涛	冯克熙	冷方南	陈可冀	陈泽霖
张发荣	张奇文	张学文	张 琪	纽思源	李振华
周仲英	郁文俊	侯 灿	赵守勋	高辉远	陆于甫
郭铭信	曾桂芳	詹文涛	路志正		

编 委

邓文龙	毛嘉陵	孔庆洪	王玉英	刘心毅	刘燕玲
吕克潜	江幼李	何裕民	邹伟俊	吴昌培	李家杰
孟庆云	胡京京	胡学士	张云翔	张西俭	贾河先
郭剑华	黄宏昌	曾德环	谢亚松		

导　　言

正在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中医学无疑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然而，中医学也向现代科学技术提出了挑战——它那经过两千多年临床检验的理论和方法，深刻地反映着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客观规律，现有的科学技术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吗？

这个两难问题实际是一回事——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学的成功研究，也就不能实现中医学跟上时代的新步伐。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然而眼下的实践，却异常地步履维艰。

困难在于，已有的科学技术习惯于把人和整个世界理解为“简单”的“自动机”，而中医学则坚持把人和整个世界理解为“复杂”的“有机体”。“简单性”与“复杂性”，“机器模式”与“有机模式”，两种观点，两种方法，在中国撞击了100多年。古老的中医学困惑了——坚持“复杂”的“有机体”，还是把它改造为“简单”的“自动机”？中西汇通派试验过，废止旧医派论争过，中西医结合派作着新的探索，如果说大多数、也应当说相当多的人倾向于后一方案，因为，它是整个科学所赋予的思想。

然而，当我们的医学家沉醉于他们宝贵的“科学思想”

的时候，整个现代科学却在奋力调转船头，离开“简单”的“自动机”，驶向“复杂”的“有机体”。现代科学革命的旗手之一普利高津写了《探索复杂性》，强调现代科学正结束“世界简单性”信念，兴趣正从“粒子”、“机器”转变到“关系”、“信息”、“时间”、“生命”上来。他写道：

“科学的每个伟大时代，都引出某个自然界的模型。对经典科学来说，这个模型是钟表。对19世纪的科学，即工业革命时代来说，这个模型是一个逐渐慢下来的发动机。对于我们来说，标志可能是什么呢？”^①

“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②

现代技术革命的号手阿尔文·托夫勒写了《第三次浪潮》，宣称人类正从“机器时代”进入“信息时代”，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人们对世界已有的理解和信念，应当从窘迫和苦恼中清醒过来，赶上新的潮流。他说道：

“假如时代能尖叫的话（我们的时代当然像是能尖叫的），那末机器时代正尖叫着要停下来。工业时代的衰老迫使我们面对着现实世界机器模型的讨厌的局限性。”^③

“我们是旧文明的最后一代人，也是新文明的第一代人。因此，我们之所以产生窘迫、苦恼和毫无头绪的境地，正是我们本身的矛盾，……以及垂死的第二次浪潮文明同挟雷带电而来的第三次浪潮文明之间的冲突造成的。”^④

时代在转折，科学问题在深化，复杂性、有机性成为主

题，生命和人日益成为科学家关注的典型对象。然而，这样的课题和对象与“简单”的“机器模式”格格不入，但我们却习惯于运用这样的旧模式；这样的课题和对象需要全新的研究模式，但因为它属于第三次浪潮而我们尚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

关于人的那许多难题，无论是健康和长寿问题，还是疾病和治疗问题，既是中医学的，也是整个现代科学的。加上气功、人体特异功能、新兴的人体科学把人的功能态这一复杂性和有机性最高的课题摆上现代科学的前沿，按钱学森的观点，它将导致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幽灵正在游动。

时代把成堆的课题提上日程，我们向哪里寻找万能的钥匙？普利高津说，要把西方和东方的传统结合起来向着新的自然观前进；托夫勒说，第二次浪潮的衰老的机器模式令人讨厌，第三次浪潮与第一次浪潮有更多的共同点。著名的李约瑟博士则从全部科学史的角度提出：

“人类将如何来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照东方见解行事。”⑥

“事实上，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⑥

宙斯的潘多拉盒子把困难、灾祸撒向人间，而把“希望”隐藏在盒底。现代科学的潘多拉盒子把难题摆在全世界面前，希望留在东方。按东方见解行事，这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呼声。

科学家们一再追溯老子、邹衍、沈括、朱熹的思想，认为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相关性是中国科学和哲学千百年来探索的目标。在这种

探索中，走在前沿，与最高的有机体“人”直接打交道的，是另外两位伟大学者——岐伯和黄帝。

岐伯和黄帝研究人的疾病，研究人的生命，创立了关于人的有机规律的一整套理论——岐黄之学。他们的研究，始终如实地把人理解为复杂的有机的生命，如实地把人理解为宇宙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要素，从未试图把它“简化”，从未接受或运用过“机器模式”，他们创造并发展了自己的研究方式——岐黄之道。

岐黄之道，这是中国医学的思路，是东方见解的精华。它，是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的方法，是认识复杂性和有机性的道路，是全面地理解人的钥匙。

岐伯和黄帝可能是多少天才头脑的化身，正因如此，岐黄之道成为整个中国医学共同的、牢固的思想基础。从南到北，从古到今，虽有千家百论，但岐黄之道是贯穿所有中医理论的一条红线。纵有第二次浪潮机器模式的猛烈异常的冲击，它迄今也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异。

岐黄之道是岐黄之学的精髓。其实质，是系统论思想。尽管它的形式是朴素的，但其内容在性质上却与现代系统科学完全一致，处处闪耀着东方智慧的光芒。

如果说，岐黄之学曾被历史的风雨蒙上尘沙，因而需要发掘和阐发，那末，岐黄之道则隐蔽得更深，需要更加深刻地探究和精心地雕琢。现代系统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在时代最需要岐黄之道这种科学思路的时候，同时为研究和发展这种思路准备了时代条件。

尽管经过十年努力，本书对中医系统论思想的发掘和阐发，仍不过是在一块处女地上翻开一锹新土，岐黄之道的深

邃思想和丰富内容，远未尽收眼底。但是，从这里，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为什么要按东方见解行事。岐黄之道，这是东方见解的精华，是中医学特色的实质和核心，是中医学迎头赶上“系统时代”的“通灵宝玉”，是中医学在医学和科学的未来发展中的巨大优势所在。

对中医系统论思想的发掘和发展，尽管还要走一段比较长的路程，还要克服重重困难，也还会有怀疑和非难。但是，从整部科学技术史，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全局看，我们不能不确立并坚持与李约瑟博士相同的观点：

“中国传统科学的思想复合体，在现代科学发展面临决定性阶段的时刻，将发挥大于人们所承认的作用。”

参考文献

- ① 普利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 ② 同上。第57页。
- ③ 同上，第8页。
- ④ 转引自王身立：《热寂论与负熵论》，《系统工程》1986年第3期。
- ⑤ 《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
- ⑥ 同上，第217页。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两种文明的撞击	(1)
从“原子”到“细胞内战”	(1)
从“元气”到“辨证论治”	(5)
“汇”而未“通”	(9)
“废”而未“止”	(13)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15)
第二章 东方智慧之光	(22)
从“分析”走向“系统”	(22)
不可思议的“易”	(28)
最确切的表达式——“太极图”	(34)
正被定量描述的“道”	(38)
振聋发聩的宣言	(41)
发展中医系统学	(45)
第三章 疾病发生在哪里	(50)
简单性与复杂性	(50)
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	(55)
人，还是机器、积木	(60)
“治病”与“治人”	(64)

• 1 •

第四章 最终的原因	(71)
实物中心论	(71)
系统中心论	(77)
中医学“不和的模式”	(87)
岐黄握住两个矛盾	(92)
第五章 结构病与功能病	(104)
疾病大都是器质性的吗	(104)
结构的功能	(109)
功能的结构	(114)
“证”是异常功能态	(119)
第六章 平衡与稳定	(131)
形形色色的平衡	(131)
从贝尔纳到维纳	(137)
普利高津的新原理	(145)
熵 病	(150)
阴平阳秘≠阴阳平衡	(157)
第七章 “治”与“调”	(166)
远在“魔弹”射程之外	(166)
人体调节防卫的活动原则	(170)
中医治疗三原则	(179)
中药方剂三原理	(185)
第八章 黑箱与白箱	(194)
科学面前的黑箱	(194)
控制人体的艺术	(199)
人体要白箱化吗	(206)
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	(212)

第一章 两种文明的撞击

东方和西方有两种不同的科学传统，中医和西医是这两种不同科学传统的产儿。以一种传统为标准来评判另一种传统，必然导致误解。近代以来对中医学的种种非难，正是这样一种误解的反映。应当彻底地从这种误解中清醒过来。

从“原子”到“细胞内战”

中医和西医在学术上的差异如此广泛而深刻，在科学史上几无他例。对其原因之分析，百家千论，见仁见智，然其要者，不失两个方面：人和疾病的高度复杂性，是中医和西医分别从不同角度各自把握不同内容的客观条件；中医和西医分别运用着“系统论”与“还原论”两种不同思路，是中医和西医能够在同一对象上分别把握不同内容的主观条件。中医和西医之所以形成这样两种不同思路，当有医学本身的内在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传统科学思想孕育而成的。

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应用学科之一，其方法和理论的形成、发展，必然植根于其科学母体之中。而自然科学，又

是从古代自然哲学的体系中分化出来的。由于古代东方和西方有两种不同的自然哲学思想，它孕育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经过近代的分化，其差别愈加深刻，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两种不同的科学传统，对东、西方两种医学的发展，造成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

西方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贯穿着原子论的传统。原子论发轫于古希腊的留基伯（约公元前500～440）与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所谓“原子”（atomos，希腊文意“不可分割”），是构成世界的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认为：

“原子是不可分的，并且是不变的，它们的本性是完全坚固，用任何方法都不能把它们分解成部分。”^①

原子是构成世界的不可再分的“宇宙之砖”，是不变的最终始基颗粒。原子没有质的不同，仅仅大小、形状各异，在数量上无限，是无数个一。世上事物的无限多样性，源于不同数量、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原子的不同组合。原子象字母，可嵌合成不同的词、句、文章。原子本身既是最小的又是不变的，世上事物的变化源于原子的数量和组合的变化。

其他的原子论者如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25～445）、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等，提出原子不仅有纯粹量上的差别，也还有质的差别；提出“自然最小量”理论，认为事物不是无限可分的，在某一点必定有一个可分性的界限，即每一种实体都有特定的自然最小量。

原子论试图对世上各种事物的特定形态、及其多样性和可变性给出一个统一的、最终的解释。按照这种思路，要了

解事物及其变化，就要把事物的整体及其复杂现象加以彻底分解，直至找到最终的、不可再分的“原子”或“自然最小量”。这样，在方法论上就形成了还原论思路。

“原子论是一种最古老的、人们所熟用的科学还原方法。这种方法把任何复杂的和发展着的客体看作为由无限多数量的较为简单的实体所组成的。原子论简化了质的方面，却把客体的数量特征和结构方面复杂化了。”^②

原子论在整个中世纪受到冷遇，16世纪以后，随着文艺复兴和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发展，原子论也再度复兴，还原论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的、有效的方法武器。杰出的成就首先是在化学领域，约翰·道尔顿（1766～1844）创立了科学原子论。他继承了先辈们关于原子的思想精华，从化学的角度找到了决定事物化学性质及变化的最小颗粒——具有化学元素性质的原子，提出了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论断。他在《新化学哲学体系》一书中强调了：

“确定最终粒子，简单和复杂物质的相对重量，确定组成一种复杂物粒子的简单基本粒子的数量和确定形成一个更复杂的粒子的较为不复杂的粒子的数目的极大重要性。”

物理学和物质结构研究的发展，不但确证了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而且证实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质子和中子等基本粒子由层子构成，等等，还原研究取得一次又一次突破性胜利。与以往不同的、也是构成19世纪末物理学革命的是，完全冲决了传统的原子不可再分的观念，发现了它的内部结构和内在矛盾；而且，随着量子力学的建立，证明不仅在实物形态上可以追寻最小粒子，而且在能量上也已找到“自然最小量”——量子。

在近代以来400多年历史上，还原论思路成为生物学和医学的最得力的方法论武器，并发展了最典型的还原研究方法，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整体由部分构成，应当而且可以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来认识，生命的整体性能，可以从它的组成部分的性能完全解释清楚。

第二，生命运动是由较低级的物理、化学等运动组成的，应当也可以把生命的高级运动还原为低级运动来认识，生命和疾病的现象完全可以用物理、化学规律来解释清楚。

在这条思路指导下，生物学向生物体的内部结构开拓，认识从整体、细胞一直深入到分子和亚分子水平。

在这条思路指导下，医学也大踏步地向人体结构的微观方向深入，一层一层地去寻找决定和表现疾病过程的“始基粒子”和“最少量”。1543年维萨里（1514～1564）发表《人体的构造》，开始了向人体内部的进军；1761年，莫尔迦尼（1682～1771）发表《论疾病的定位和原因》，标志着器官病理学的建立，把疾病定位于器官；18世纪，毕夏（1771～1802）提出了“膜理论”，把人体分为21种不同的组织，建立了组织病理学，把疾病定位在组织上；1858年，微尔肖（1821～1902）移植了20年前由施莱登（1810～1885）和施旺（1810～1882）创立的细胞学说的成就，创立了细胞病理学，把疾病定位于细胞上。

微尔肖的细胞病理学达到了西方近代医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他在《细胞病理学》一书中发表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宣言：

细胞来自细胞，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的总和，机

体是细胞联邦，疾病是细胞联邦的内战，整个病理学就是细胞的病理学，疾病的本质在于特定细胞的损伤，一切疾病都是局部的，谁再提出全身性疾病问题，那是他把时代搞错了。

20世纪，医学家们攻克了微尔肖的“细胞联邦”，建立起分子病理学，并且迎来了“提出全身性疾病”的新时代。然而，西方科学和西方医学的传统，似乎仍作为传统在医学中延续着。

从“元气”到“辨证论治”

中国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贯穿着元气论的传统。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内容丰富，而其要者，可谓一河两端——一为仁学，一为气论。仁学者，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哲学思想，属社会历史观。气论者，是关于自然界的哲学思想，属自然观。中国的科学和医学，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仁学思想的影响，但就其方法和理论发展的主线来讲，主要是受气学理论的影响。

元气学说始于战国，成于两汉，其丰富和发展延续至明清。元气学说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相交汇，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自然哲学思想，其观点和方法显示出与西方的原子论和还原论截然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世界的本原是气。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物质。现在的一般理解是：“一、它是未成形质、连续无间的物质；二、它可以向有形质的、间断的物质转化；三、它是有形质的、间断的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四、在一些元气